

# 东亚近代概念编成史的意义与方法

□ 铃木贞美\*

## 一、概念研究

东亚各国在接受欧洲近代知识的同时,也形成了各自独特的知识系统和价值观。我以为,首先应该对这些价值系统和价值观的形成过程进行文化、历史的考察,然后才能对东亚和欧洲的“近代”进行比较分析。

关注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各个概念的位置以及所反映的价值观,亦即,把考察的重点放在概念编制的整体性重构上,可以大大突破过去的研究局限,写出新的文化史。其成果也将会对各个细分化的学科的既成结论产生巨大冲击。但是,我们把我们所属的知识体系、安身立命的知识结构的过去与现在作为研究对象,并将自身相对化,是一个伴随着自掘坟墓危险的困难工作。而且,对具体的概念及其形成过程进行重新梳理,是一个工作量巨大的事业,要取得一定的成果需要知识界的通力合作。

例如,作为基本人权之基础的“自由”、“平等”概念,在前近代的日本,是和生命的“自由、平等”密不可分的。这一点对近现代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此外,结合人格之“独立”等观点进行分析,可以获得单一概念的研究无法获得的成果<sup>①</sup>。知识

\* 铃木贞美,日本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① 关于明治时期的情况,请参见铃木贞美:《明治期日本の啓蒙思想における「自由・平等」——西周、福沢諭吉、加藤弘之をめぐる》,《日本研究》第40集,2009年。

体系是通过学术各个领域概念的相互关系、概念体系 (conceptual system) 过程体现出来的。我们将其背后的价值理念和支撑它们的文化制度的变迁结合起来,称之为概念编制史。概念作为知识界普遍共有的事象,其各自的创始、流通、固定、变迁过程,都需要进行分析。同时,对教育制度和媒体的作用之研究也不可忽视。

不了解概念的变迁,以今天的理解去套读过去概念,会落入误读的陷阱。中国现代文学巨人鲁迅(1881—1836年)在散文《门外谈》中用讽刺的笔调写道,最近赶时髦的人们用“文学”来称呼古典,这个词并非来自“文学,子游、子夏”,而是从日本进口的英语“literature”的翻译<sup>①</sup>。“文学,子游、子夏”是《论语》(《先进》篇)中有名的一节。在这之前是:“言语,宰我、子贡”。相对口头辩论,“文学”指文字、文章。《辞源》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80年)“文学”词条释义的第一点就是用上述例子来说明的,意为“文章博学”。第二则援用《汉书》武帝纪中的例子,说明文学有“文献经典”意思。释义第三指官职名称。管理儒学为主的经书,和“祭酒”等并列的官职名为“文学”。在古代日本,也曾使用之,是江户时代各藩藩校教师称呼的一种。

近代日本广泛使用的“文学”相当于人文学,上述鲁迅文中并无此义。对此,稍后我将详述。显然,如果研究者在分析时以为自己现在使用的学术用语、概念体系在过去就已经存在了,那将会犯方法论上的错误。比如,鲁迅在《摩罗诗力说》(1908年)里,使用了“纯文学”一词,如果把这个词理解为和现在使用的“大众文学”相对的概念,那就大谬不然了。“大众文学”一词是20世纪20年代与文学青年的“文坛文学”相对而造出来的日本词语,这里将佛教专用“大众”一词转作 Mass media 的 mass 的语意了。在经历了各种曲折后,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日本文学界才最终确立“纯文学”与“大众文学”的格局。然而,在这之后,明治时代使用的“纯文学”居然被当作与“大众文学”相对之概念而被移花接木,这样的理解甚至被套用在明治之前和江户时代的文艺现象之中。这些都是对过去词语意义和概念编制不加分析,而将今天的意义和模式套用在过去的方法论上的错

<sup>①</sup> 《鲁迅文集》第6卷,竹内好译,东京:筑摩书房,1978年,第30页。铃木修次:《「文学」の訳語の誕生と日・中文学》,吉田敏一编:《中国文学の比較文学的研究》,东京:汲古书院,1986年,第336页。

误例子<sup>①</sup>。那么,鲁迅所谓“纯文学”是针对什么而言的呢?日本近代代表性作家夏目漱石进入《朝日新闻》社后创作的第一部报刊小说名为《虞美人草》(1907年),书中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的一个主人公说,“哲学与纯文学分科不同”<sup>②</sup>。东京帝国大学1904年实施了大改革,在“文科大学”内部,分出“哲学”、“史学”和“文学”。其中“文学”还细分为国文学、支那文学、梵文学、英吉利文学、德国文学、法兰西文学、言语学等各科<sup>③</sup>,并没有“纯文学”一科。这里的“纯文学”是针对“哲学”和“史学”而言的,指日本文学、中国文学、英国文学等“用文字书写的语言艺术”。

然而,漱石也好,鲁迅也好,为什么不单用“文学”一词,而特意要使用“纯文学”呢?这是因为1877年成立的东京大学文学部等使用的“文学”是更为广义的,相当于欧洲“humanities”(人文学)的意义,不同于“用文字写成的语言艺术”。事实上,明治中期以后,“文学”一般采用上述的广义概念。与此相对,“由文字写成的语言艺术”,则被称为“美文学”、“纯文学”。日俄战争后一个时期,年轻知识分子多用“纯文学”指称“文学”,《虞美人草》便是这个时期的作品。

如上所示,概念史研究可以避免误读,正确使用分析框架是研究任何领域都必须考虑的。了解概念之间的关系也是需要的。更进一步说,将概念编制所代表的知识体系作为研究对象,可以开启全新的文化史研究。

以下,本文将讨论日本近代知识体系建构问题,具体而言,日本的综合大学制度和明治中期出现的“日本文学”(Japanese literature)——日本人文学(Japanese humanities,后来分为人文科学 human sciences 和社会科学 social sciences)的特征。东京大学1880年设立“法、理、文、医”四个学部,1886年又将这四个学部调整重组,设立了帝国大学,这四个学部外加工科大学,三年后又增设了农科大学。在当时,作为综合大学(university),这样的学科设置是非常罕见的。日本人文学大量吸收了神话与宗教书籍、国语(national language)以及用汉文书写的书籍,还有民众文艺(popular literature)。在世界各国的人文学科建设中,这也是非常罕见的现象。

① 铃木贞美:《“日本文学”の成立》第2章第3节,东京:作品社,2009年。也参见《『文藝春秋』とアジア太平洋戦争》第2章第3节,武田ランダムハウスジャパン,2010年。本文参阅了拙著《“日本文学”の成立》序和第1章的主要内容。

② 《夏目漱石全集》第4卷,东京:岩波书店,1994年,第308页。

③ 1919年,分别改为法学部、医学部、文学部、工学部。

## 二、知识分科

一般来说,东京帝国大学的制度对社会的影响更大<sup>①</sup>。在这之后,随着京都帝国大学的设立(1896年),东京帝国大学的学科设置发生了很多变化。

日本综合大学的第一个特点是没有相当于欧洲大学的神学院,神学是欧洲大学的基础。日本最初制定大学规划的时候(《大学规则》,1870年),曾经设想设置相当于神学院的科系(以皇学和儒学为主的“教科”)。但是,东京大学成立时,这个设想没有付诸实施。皇学和汉学被分别归入文学部第二科和汉文学科(第一科是史学、哲学、政治学科),其原因大概是文部省内的“洋学派”影响所致<sup>②</sup>。1904年,宗教学在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哲学科内设立(姉崎正治担任,内容为比较宗教学)。近代欧洲人文学针对神学而出现,而宗教学则附属于神学。日本学科设置打破了这种编制。这样做是为了从天皇家以往崇奉的神、儒、佛中排除佛教,进入西欧列强之列。为了夸耀日本历史悠长,1872年,政府将日本神话中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即位那一年定为日本历史纪元。在这个前提下,以保障信教自由为条件,1882年政府宣称“神道是皇室祖先崇拜,并非宗教”,将神道置于宗教之上。其后(1889年),帝国宪法参照了保留王权神授条文的普鲁士等国的国家基本法,加入第三条“天皇神圣不可侵犯”条文。这些后来都成为国家神道渗入日本法学和人文学的法理上和制度上的保证。曾任东京大学总理(医学部除外,1881—1889年)、帝国大学校长(1890—1893年)的加藤弘之在《关于国家生存之最大基础的东西比较研究》一文中认为,天皇制是古代“族长政治”的延伸,“我国君民真正具有一家亲子的关

① 比如西周将 philosophy 翻译成“哲学”的例子广为人知,那是因为东京大学在创立时,理学部和文学部的科目名称采用了“哲学”,“哲学”一词由此而普及开来(三宅雪岭:《哲学涓滴》,东京:文海堂,1889年)。但是,当时“哲学”仍和“理学”混用,比如中江兆民构筑其独特的唯物论哲学著作《理学钩玄》,出版于帝国大学设立的1886年。

② 文科大学开始设置了哲学、和文学、汉文学、博言学(言语学)四科,第二年的1887年增加了史学、英文学、德文学科。1889年增设国史科,和文学科则改名为国文科,汉文学科改名为汉学科。1893年又改为讲座制,共设20讲座。1897年随着京都帝国大学的成立,改称东京帝国大学。1904年又实行了大改革,文科大学内部,大学科分为哲学、史学、文学。其中文学又细分为国文学、支那文学、梵文学、英吉利文学、德文学、法兰西文学、言语学。这次改革后汉文学名称消失,被解体后分别归入哲学中的有“支那哲学”、史学中的有“东洋史学”、文学中有“支那文学”。1919年,增加了法学部、医学部、文学部、工学部。文学部内的组成又一次被分解。第二次大战后,文学部内哲、史、文,从第一类改为第三类。1963年社会学、心理学从“哲学”中分离出来,归为第四类。

系”、“殉国之义”，中国对父母的“孝”和对君主的“忠”不加区别，而日本“对君的忠与孝一致”<sup>①</sup>。儒学所说的人民，亦即“天子之赤子”的想法只有在不会发生“易姓革命”的日本才能纯粹地一以贯之。因此，加藤主张“忠孝一体”、“万邦无比的国体”<sup>②</sup>。这就是所谓家族国家论。

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教授（宪法学）穗积八束在《国民教育爱国心》（1897年）一书的开头说：“我日本民族的固有体制乃血统团体。（中略）吾人的祖先亦即我之天祖。天祖乃国民之祖、皇室国民之宗室。”<sup>③</sup>这是所谓血统国家论。

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宪法学教授笈克彦著《古神道大义》（1912年），主张要在明治天皇逝去之后，收拾乱世，重整山河。他说“古神道”是出于方便所取的名称，它“在日本国成立当初就已经存在，并与日本一同发展壮大，现在还在发展之中”<sup>④</sup>。“没有万民则无天皇”，反过来说，“对日本人民来说，没有一个人能够离开天皇而存在。众生皆因天皇得其生，无天皇则无今生，则无日本人民”<sup>⑤</sup>。这正是使“日本民族日本国家一心同体”得以存在的基础，是“活的宗教”、“生活的根本规范”，既是“日本民族的普遍的理想”，也是“世界的普遍的理想”。笈克彦主张要以本居宣长、平田笃胤的“复古神道”为基础重新建构国家，通过明治宪法和教育敕语等制度化的神道精神“涵养人心”<sup>⑥</sup>。这看似和政府保障“信教自由”、“神道非宗教”的见解相违，其目的在于将“国家神道”与其他宗教区别开来，将国家神道置于其他宗教之上，并使其再生。他参照了德国新教神学施莱尔马赫《宗教讲演》（1799年）一书，把“绝对依存的精神倾向”这个宗教定义套在日本神话诸神之上，并解读为“天皇”、“归一”（神人归一、人人归一）的精神，将天皇绝对化。并参照施莱尔马赫《基督教信仰》（1822年）把耶稣表述为神向人类“显现”，他将《日本书纪》卷7景行天皇四〇年、《续日本后纪》卷19嘉祥二年三月记述的天皇看作“现人神”。在《续古神道大义》（1915年）上下二卷中，他提出“古神道中神的观念便是唯一绝对之大生命及其表现者”；“唯一绝对之大生命”也可以表述为“宇宙之大生命”、“世界之大生

① 《加藤弘之文书》第3册，京都：同朋社，1990年，第178页。

② 同上，第222页。

③ 穗积八束：《国民教育爱国心》，东京：八尾新助书店，1897年，第1页。

④ 笈克彦：《古神道大义》，东京：清水书院，1912年，第2—3页。

⑤ 同上，第10—11页。

⑥ 同上，第84—85页。

命”,其表征“天皇”是“和高皇产灵神并列,与天照大御神一体的宇宙主宰者”,因此,是世界人类“大生命”的衍生者,而不仅仅属于日本民族<sup>①</sup>。笈还极力主张“古神道”的本性是“宽容”,“活跃生动的和平主义”,既不是“侵略”,也不是“退缩”<sup>②</sup>,是接受一切、救赎、同化的“理论”。他说,现实中古神道没有排斥儒教、佛教,而是通过将佛教日本化,使佛教获得新生,基督教也将会如此。

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教授井上哲次郎长期君临日本哲学界,他在《日本精神之本质》(1935年)开卷部分说,所谓“惟神之道”,就是“至诚”、“神人合一”、“公明正大”、“清明心”,儒学、道家思想、阳明学、大乘佛教、德国哲学都具有共通的遵从天地自然的普遍精神,“今后日本民族应该努力通过惟一道发扬自主精神,积极融合、调和东西洋文化”<sup>③</sup>。他还说,在日本形成的思想当然会打上日本的烙印。日俄战争后,日本盛行顺从自然、站在人类普遍主义立场上促进东西文明融和的思想,但是,在书的后半部,他咬定佛教是只救赎自身灵魂的宗教,而“实现神国、世界统一这一伟大理想”<sup>④</sup>,是神道的长处之一。这种用公义(公共性)攻击佛教“私性”,是儒者常用的手法,但他倾向于用“惟神道”来实现世界统一。

如果能够对这些弊端充分反省,人文学中包涵宗教学这一制度本身,可以很容易地把反映包括宗教在内的价值理念的语言作品作为人类活动的一部分。这也应该是后人道主义者所期望的。而且在欧美,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很多大学开始缩小神学部,或者干脆不设神学部,或将其归入人文科学部,这个倾向一直延续到现在。

日本大学的第二个特征是,在帝国大学创立伊始,设置了包括建筑、土木工程学的工学部。东京大学1885年有工艺学部(理论研究为主),这个学部和工部省(1885年废止)下属的工部大学校合而为一。在欧美,19世纪中期,蒸汽机的改良方兴未艾,电力研究也如日中天,受到产业界的推动,工学(engineering)在高等教育中极受重视。能源工学作为学问(science)之一得到承认。德国设立了很多专科学校,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剑桥大学等综合大学也设立了工科大学。东京帝国大学的学科设置或许受到其影响。但是在欧洲,学问或科学(science)和技术(“technology”或

① 笈克彦:《続古神道大義》下册,东京:清水书院,1916年,第692页。

② 同上,第753页。

③ 井上哲次郎:《日本精神の本質》,东京:清水书院,1935年,第75页。

④ 同上,第157页。

“engineering”)相距甚远,如土木建筑学要成为学术研究的正式门类,还是相当困难的。在国际上,综合大学纷纷设置工学部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事情,英语圈里的“science & technology”(科学技术)据称是在20世纪70年代才成为熟语的。

中国传统上不十分强调艺与术的区别,朱子学将所有学问都归结在“天理”的统摄之下。清朝士大夫阶层重“学”轻“艺”的倾向很严重。与此不同,日本的官僚、知识阶层的大多数由武士构成,面对列强的殖民侵略,他们具有强烈的危机意识,他们极其重视武力的作用。在学科编制上,幕末的儒者佐久间象山在向幕府提出建议制作大炮的《文久二年九月上书》(1862年)中说,朱子学的信奉者应该学习西洋的学艺物理。稍早,通过学习荷兰天文学等知识而创立独自学问的三浦梅园记录了长崎出岛一位翻译的话:“西洋之学毕竟是穷理之学也。”<sup>①</sup>梅园从重视实际观察出发,对朱子学的所谓“天理”持怀疑态度。他有这样的想法,是很自然的。

就这样,当时日本的武士已经察知能源工学时代来临,要进入列强之伍必须富国强兵。实际上,幕府末期偷渡到英国的伊藤博文等长州藩“五杰”之一的山尾庸三,就因为曾经在格拉斯哥大学求学之故,邀请确立蒸汽动力发电厂性能对比标准的朗肯(W. J. M. Rankine)的弟子戴尔(Henry Dyer)等八名英国教师到工部省(1877年)。1873年,他开设工学寮,在东京帝国大学设立时改称“工部大学校”,学制六年。此外,在荷兰莱顿大学学习的西周回国后,刊行《百学连环》,关注英国能源问题<sup>②</sup>。可见,日本的旧武士阶层以朱子学为接受近代学问的媒介,将欧洲的科学与技术(technology)作为一个领域来接受。

第三点特征是帝国大学成立后第三年,设立了农科大学。这是学习德国综合大学设立化学和生物学之类学部的做法,农商务省很早就招聘德国农学家。在农业政策方面,不是美国式的“牧畜中心的大农法”,而是走向以化学肥料为中心包含应对自然灾害的农艺科学。借此,政府各省厅管理的研究机构被置于文部省一元化管理之下。日本将中国台湾、朝鲜等变为自己的殖民地后,又在这些地方相继推行了帝国大学的模式。当然,在不同地方各有其不同特点。

总之,日本近代学术首先是重新调整江户时代的“旧”,及至明治期则以“新”取而代之。在接受西洋学术时,传统的概念体系作为接受的媒介而起作用,接受一方

① 《三浦梅园全集》上卷,东京:弘道馆,1912年,第1103页。

② 《西周全集》第4卷,东京:宗高书房,1981年,第260—285页。

和被接受一方之间发生变化,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独自的学问体系。如果能够揭示这一复杂过程,语言翻译乃至学术整体上的旧说,很多都要改写。

### 三、“文学”/“人文学”

以下再看日本的“文学”(人文学)概念。

直到江户时代,“文学”依然是指以儒学为中心的来自中国的学问,在“和歌”和“物语”中,我们找不到指称“文学”的例子,也即,在日本不存在相当于近代文学的概念。明治前期,作为“literature”的翻译语,文学具有指称整个学问的宽泛含义和日本人文学的含义<sup>①</sup>。明治中期,前者含义基本消失,留下了广义的“文学”意思,这个时期出现的“日本文学史”概念直到今日依然被使用,它最早指《古事记》(皇室神话)、《日本书纪》(神话与历史)和《风土记》(地理志)。此外,狭义的“文学”(以文字表示的语言艺术、诗歌、戏曲、小说和表现感情的散文,被称为“美文学”和“纯文学”),引起了各种争论。相反,明治后期涵盖学问与技术的“艺术”概念被废止不用,明治前期出现的“艺术”(fine art)一般指“美术”。在1910年前后,以绘画和雕塑、雕刻为中心的狭义“美术”分化、固定化。几乎与此同时,狭义的“文学”在专家圈内得到普及。论坛与文坛的分化也发生在此时<sup>②</sup>。“日本文学(史)”的特征有二:第一,依据前述日本人文学的范畴,它包含神话与宗教书籍;第二,无视欧洲国家用自己的语言(national language)写作的“国文学”(national literature)规范,将汉文书籍也编入人文学内。

在欧洲各国文学史中,基于国语的认识,用自己国家的语言翻译《圣经》,从修辞角度来看,神父或牧师说教有所不同。在制度上,欧洲没有将基督教的《圣经》和神学作为人文学的对象。这是因为,明治新政府为了向列强夸耀历史悠久而将神武天皇即位之年作为日本历史的起源(1872年),将神话置于文学史之首,富有智慧的读物多用汉文所写,精英阶层学习英语的同时必须学习汉文,在初中需要学习“国语”等。

第三个特征是文学多含有民众文艺的成分。中文的“歌”中有尊重“风”之习惯。《万叶集》是仿照之而编成的。此外,还有如下复合要素:民间流传的《平家物

① 铃木贞美:《日本の「文学」概念》,东京:作品社,1998年。

② 铃木贞美:《“日本文学”の成立》第1章。



语》、《太平记》等由武家政权管理,德川幕府犹如正史一样对待之而将其用于仪礼。江户时期,特别是向18世纪转换之时,町人阶层的文化繁盛,明治前、中期知识阶层有很强的自由主义倾向。此时对俗文学的肯定受到了英国市民阶层勃兴的影响。

19世纪中叶,用“文学”来翻译欧洲“polite literature”和中文“文学博识”,在崇尚朱子学的中国,似乎很难接受欧洲重视创造性和想像力的浪漫主义文艺,相反,日本从中古时代起即承认故事虚构有其价值,江户时代町人阶层价值观的多样化打破了雅俗等级秩序,诗歌俳谐、物语及戏剧、演艺等作为不同的学科领域,萌发自我意识,这为接受浪漫主义文艺提供了基础。但是,对于创造性,日本和崇尚基督教造物主的欧洲根本有异。在日本,虽然尊崇造物主,但是,江户时代流行民众艺能、净琉璃及歌舞伎等,人们乐于改编原作,不断改动故事情节。在明治时期,人们虽然同时接受了浪漫主义与经验主义、实证主义的表现手法,浪漫主义被视为能表现丰富感情,而能否表现真实感情是评价包含古典在内的艺术的基本主线。这样,《万叶集》率真的感情表现受到重视,《源氏物语》因以浪漫却真实地表现宫廷生活而受到推崇。此后,和歌、俳谐等传统的领域不断近代化,在诗歌里出现了口语自由诗、短歌、俳句等三个领域,小说里则有随笔形式的“心境小说”、“大众文学”等;古典中则有“历史物语”和“日记文学”。19世纪末,正冈子规推崇印象鲜明和变化多彩,开始将庶民的游戏俳谐作为语言艺术,名称亦改为“俳句”。蒲原有明的象征诗集《春鸟》(1905年)序中,将芭蕉俳谐作为象征主义文艺来评价。国文学者芳贺矢一《国文学十讲》(1899年)把《平家物语》、《太平记》等叙事称为“历史物语”,作为艺术作品来鉴赏。1925年前后,国文学者池田龟鉴将王朝女官所写的日常故事称为“日记文学”、“自照文学”。这是根据近现代艺术规范对古典进行再解释。“自照文学”流行的背景是,日本接受了欧洲“*Ich Roman*”的“私小说”,进入20世纪后不断深化对观念/意识哲学的认识;而围绕“心境小说”的议论所造成的混乱,一直延续到今日,可谓经久不衰<sup>①</sup>。1925年前后,以大众社会为背景的小说内部出现了“大众文学”,文坛一分为二。1935年前后,在当代通俗小说中,将娱乐性较强的作品归入“大众小说”,“艺术小说”与“大众小说”的二分法,与不同群体的存在以及新生代有关,但是,对综合性杂志和报纸刊载的小说分析可知,以艺术性、思想性的多寡来进行分类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① 铃木贞美:《「日記」および「日記文学」概念をめぐる覚書》,《日本研究》第44集,2011年。

从20世纪2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所谓文艺界出现“自然主义现实主义”、“无产阶级文学”和“现代主义”三派鼎立说(平野谦)是不成立的。就小说而言,“时代小说”和“侦探小说”中都可以看到大众文艺运动及其相互渗透的影子<sup>①</sup>。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文艺杂志分为“纯文学”、“中间小说”和“大众文学”三层。在重视“纯文学”的知识分子中出现围绕“纯文学”和“大众文学”的二元对立,经历1961年“纯文学变质论争”后结束。在模式论的影响下,江户时代文化文政期有“大文学”与“小文学”之别<sup>②</sup>,明治期有“文学”和“大众文学”的不同<sup>③</sup>,产生了一种可以称之为倒错性的争论。江户时代的文化虽然有公家和武士的亚文化尚雅与町人阶层的俗之严格区别,但是,还没有打破这种区别的分科意识。明治期以前,虽然论者的价值观有高低之别,也没有出现普遍的二分法。

总之,只有明确近现代出现的学术制度和文艺分科的过程,才能展开关于日本近现代文化史、文学史的新研究。而且,这也是今日要进行的有关学术再编之研究的准备。在此,单单追踪一个概念的变化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对应概念的研究是需要的。而且,对概念编制、大概念、小概念和同等概念之研究进行考察实为重要。考究语汇与概念的不同,以及伴随价值理念的转换,与近代概念相类似的传统概念再编的文化、历史诸条件的考察,才成为可能。惟有通过不断积累具体个案的严谨的研究,才能最终迈向文化史整体的重写。

(王娟、王晓葵译)

① 铃木贞美:《梶井基次郎の世界》,东京:作品社,2001年。

② 中村幸彦:《近世儒者の文学観》,东京:岩波书店,1958年。

③ 柳田泉等编:《座談会明治文学史(三)》,东京:岩波书店,2000年。